

中國思潮評論



高瑞泉 主编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

- | | |
|----------------------|-----|
|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历史、理论与方法 | 高瑞泉 |
| 中国大陆25年来思想论域之演变 | 林同奇 |
| 百年变革中的三种思想选择 | 萧功秦 |
| 自由主义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 | 崔宜明 |
| 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道路 | 陳 赟 |
| 20世纪中国思想的特质及其研究方法的思考 | 胡伟希 |
| 20世纪的国学思潮审视 | 干春松 |
| 20世纪中国佛教思潮及其研究反思 | 唐忠毛 |
| 中国历史学如何回应时代思潮 | 杨念群 |
| 重访儒家传统与现代思想之连续与断裂 | 墨子刻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思潮評論



高瑞泉 主編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高瑞泉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

(中国思潮.第1辑)

ISBN 978-7-5325-5376-1

I. 思... II. 高...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2916 号

中国思潮·第1辑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

高瑞泉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235,000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5376—1

B·666 定价:36.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中国思潮评论》

主 编 高瑞泉

编辑委员会

陈少明	陈卫平	胡伟希	胡逢祥
干春松	高力克	高瑞泉	顾红亮
郭齐勇	李维武	齐卫平	吴根友
许纪霖	许苏民	张利民	郑大华

序

编辑《中国思潮评论》最直接的目标,是为了推动和展示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学术研究。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进路,“思潮研究”即是其中重要之一途。其原因大约有三:第一,与人物个案、主义或问题之进路相比,“思潮研究”更具有历史整体性,它要求从现象出发,注意到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变迁之来龙去脉。第二,它不能停留在一般学科史的分隔,须兼顾到学术研究“内在”和“外在”两个理路,或者说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第三,它并不先行确定某一种思想派别拥有最高裁判权,也不认为互相攻讦的思潮完全形同水火,而试图发现在名言和主义的争论背面隐蔽着的某些东西。

中国人素有厚古薄今的传统,经过“五四”所谓“激烈反传统”以后,据说已经变得一切惟新是求,而时尚之谓“新”常常与纽约、巴黎有关。晚近十年间,风气又经丕变,“修旧如新”一变而为“修旧如旧”。奇怪的是,这两样东西似乎并行而不悖。总而言之,虽然不断有人宣称已经勘明了中国文化的最终走向,“古今中西”之类的争论还是紧紧纠缠着国人。与此相应的是,对于今日中国的崛起,有些外国观察家以为中国并不可怕,因为缺少堪与西方匹敌的社会理论,他们不明白促成中国崛起的文化动力——现代中国文化之道——可能正隐身在看似纷乱的思潮更替之中。

前清诗人哲学家龚自珍曾说过:“诚知圣人之文,贵乎知始与卒之

间也。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不过,19世纪中叶的这位预言家对于“圣人”其实已经有点保留。因为他同时又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所以他要通过广泛的历史文化批判来追寻中国变革的大道。思潮研究的另一面就是历史文化批判,这种批判同时是社会批判和文化反省,它同其他追求智慧的进路一样,也是“为己之学”。中国人之众,哪一个敢说自己在不在某种思潮之中?因此,如果我们有更高的期许,研究众多中国思潮的消长起落的过程,其实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一个历史入口,在这里,同样有希望进达天人之际、幽明之序。所以,《维摩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是为序。

高瑞泉

2009年7月16日

目 录

001 序

001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

003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历史、理论与方法(高瑞泉)

019 三角张力与人文寻求:中国大陆 25 年来思想论域之演变(林同奇)

037 百年变革中的三种思想选择(萧功秦)

050 自由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崔宜明)

059 “行走的观念”:20 世纪中国思想的特质及其研究方法的思考
(胡伟希)

070 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
道路论纲(陈 赟)

111 20 世纪中国佛教思潮及其研究反思(唐忠毛)

147 因势而起 异彩纷呈——近 20 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述评
(张世保)

171 国学思潮研究

173 国学认同与学科反思——20 世纪的国学思潮审视(干春松)

191 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何爱国、姜义华)

201 思潮与学术

203 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关系简论(李维武)

215 走出两军对阵之后: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趋向(陈卫平)

231 “旧瓶装新酒”——兼论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方法(刘梁剑)

243 中国历史学如何回应时代思潮(杨念群)

259 海外视角

261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墨子刻)

289 本辑作者简介

290 编后记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



思潮研究百年反思：历史、理论与方法

高瑞泉

思潮研究不是新题目,但是“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是个大题目,需要学术界的许多同行合作,共同探讨,才可能进达“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境界。任何深入的研究,都需要对前贤和我们自己已经做的工作做必要的反省,由此形成我们研究工作的新的出发点。

一、思潮纷繁是一种现代现象

20 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20 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20 世纪又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开始的一个世纪,最终以新中国进入 WTO 结束。在 20 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全世界都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与“史”的这种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相映成趣的,是“思”的上天入地不断探索。换言之,与这一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环境、社会结构、阶级状况、生活方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之同时,20 世纪中国思想也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通常人们在书写思想史的时候只注意少数最著名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同,我这里所谓“中国思想”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即在考察中国思想的变局的时候,将曾经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作为我们的观察对象。20 世纪并不只贡献了坊间流行的教科

书所说的那几位思想家,或者说,在思想史记录的思想家后面,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它们发生了,又消失了,或者转变了,即以另一种形式再生了。思潮频繁发生,已经成为 20 世纪中国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

就思潮发生之频繁而言,这种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古代也有思潮的变化,如人们现在说的所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及清代朴学,就是对历史上那些横跨数百年的大时代中思想学术有某种主流的概括。或者说一种思想或学术形态在占据主流数百年以后,让位于另一种思想或学术形态,后者又会经历用现代人看来几乎是漫长的绵延过程。但是没有哪一个世纪像 20 世纪这样,各种各样的思潮频繁发生与转换,以至于无法用某一种学说来代表这个世纪。我们已经习惯将近代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确实,作为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时期,春秋战国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由此多多少少铸就了而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不过,当时的人对这种状况评价似乎并不高。譬如庄子就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

后来的荀子用更严厉的态度纵论当时的诸子学说:

〔1〕《庄子·天下篇》。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梟乱天下,鬻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2〕

这里不必讨论庄子或荀子的意见是否合理,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庄子所谓“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还是荀子所说“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虽然冠以“天下”这样的大词,都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思潮。刚刚随着“王官之学散于百家”的历史进程而产生的士类,也没有像现代知识分子那样同社会各个阶层、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密切的关联。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的精神现象相比,先秦时代的思想活动的主体停留在单个的“子”或者少数可称作学派的小团体;与20世纪思想活动(包括由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影响、支配到社会变迁)的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广泛性,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更不必说,虽然古代儒家有所谓修齐治平的理想,但是只有到了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思想观念和理论具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并因此成为某种共同社会信念;而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瓦解和现代价值的艰难重建,也给各种试图填补信仰真空的理论以扩展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思潮纷繁是一种现代现象。

现代中国思潮繁多的另一个原因是中西文化冲突。这场冲突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由于西方文化处于明显的强势,全球化造成了现代世界“知识的不公正分配,即新知识从北方到南方的不对称流动”,〔3〕对于20世纪中国人而言,则是新知识从西方到东方的不对称流动。西方人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人,不仅制定着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大规则,而且似乎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各种“主义”。毫无疑问,它们的传播与中国社会的诸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主义”的传播和实践过程常常呈现为思潮运动,而与之对应或对抗的中国思想也通常会

〔2〕《荀子·非十二子》。

〔3〕〔美〕丹尼尔·赫威茨:《人文学科的有待和无待》,见高瑞泉、颜海平主编:《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提出标为某种主义的主张,否则就很难有多大的社会号召力。研究者对所有这些现象称之为“某某主义思潮”。“主义”和“思潮”的对应,使得思潮这一现代现象有了相对确定的理论边界,也使得“思潮”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

二、思潮研究是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向度

正像思潮之发生不自今日始,思潮之研究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我们现在还很难精确地说清中国学者注意到“思潮”这个概念的具体时间。对于历史上思想学术乃至社会心理的变化,古代历史学家常常用“风气”及其转移来描述,它与另一个寓意同样复杂的词“时势”有一定的关系。在社会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时代,如何认识“时势”和“风气”常常成为巨大的挑战。近代以来的中国就是如此。进入20世纪以后,“时代潮流”、“世界大势”、“历史趋势”都是被反复追逐的东西。当然这一方面与进化论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基本世界图景有关,另一方面,也许是更深刻的方面,是中国确实处于变动涡流之中。对于“思潮”的研究因此而开始。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就是以“思潮”着眼的学术史,他推溯其思绪发于1902年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如果从那时候开始算起,对于近代以来的思潮之研究就有了一百年的历史了。不过,梁启超作为思潮研究的肇始者,还是有某种理论自觉的。他一开始就说: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4〕

可见“思潮”是个现代语词,当它与“时代”联系在一起被中国人日常使用

〔4〕《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的时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单数的用法。所以,在他看来,自秦以后,历史上说得上有“时代思潮”的,只有“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这个说法,被后来研究中国学术思潮的人们所继承与发展。譬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体裁就是全书通篇讲七个时代思潮,不过他不是像梁启超那样描写历史,而是将时代思潮归结为哲学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去讨论。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描述近现代思想潮流的意义上使用“思潮”这个语词的。〔5〕

说梁启超有理论的自觉,是因为梁启超那本《清代学术概论》虽然是以思潮及其转变来考察清代学术史,但是已经注意到思潮尤其是“时代思潮”的一般特征。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梁启超以为只有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思想,才可能形成某种潮流。因此“思潮”的广泛影响本身就是思想之价值的表征;而“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一个时代的思潮,固然与前代的思想资源有关,但是梁启超并不用目的论来解释思潮的变更与消长。思潮之产生和发展,更多地可以用因缘来解释。思潮之为思潮,必有可以思议的内容,因而有相应的理性的成分。思潮都是由“持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思想而有“持续的群众运动”又是由其内在的张力所致;不仅在某一思想主流下面包含了不同派别和倾向的争持,而且包含了某种非理性的力量:

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粹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

〔5〕譬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只是在第五卷讨论到明清之际的“启蒙主义”和龚自珍以来的近代学术思想变迁的时候,才注意到它们是某种思潮。换言之,我们可以说,侯外庐先生注意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背景变化是出现了“思潮”现象。

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6〕

梁启超认为思潮之为“持续的群众运动”,其内部包含了理智与信仰、认知与价值、思想观念和社会运动的双重性,这虽然还只是直觉性的论断,但是却包含了深刻的洞见。

与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潮采取历史主义的描写方式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的序言中提出了思潮研究的另一种视角。他自述其书有一个新的体裁:

照这个体裁,书不以人为纲,以时代思潮为纲;以说明时代思潮为主,不以罗列人为贵。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哲学史以讲清楚这个问题为要,不以堆积资料为高。全书讲七个时代思潮:先秦诸子(分前后期)、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分前后期)、近代变法、现代革命。这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的七个中心环节,也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自然格局。所谓自然格局就是说,这不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硬套上去的。

哪一个时代思潮的哲学中心问题讲清楚了,这个时代思潮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如果能把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情况说清楚,那就更好了。不过这一点现在很难完全做到,因为这一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了。现在我希望能够比较完全做到的,是在哲学问题上比较完全地说明了一个时代思潮的来龙去脉。能多少做到这一点,就觉得所写的哲学史简明得多了。〔7〕

〔6〕《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7〕《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冯友兰先生将其哲学史的写作定位于中国历代以特定思潮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史的哲学解释,表达了某种本质主义的自信。这里当然有许多跳跃,最关键的是他将每一个时代思潮归结为某一个哲学问题,这与以往人们常说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相仿佛,但又把“时代精神论”极端化了。作为时代精神的表现的哲学是否注定只能化约为某一个问题?而对哲学问题的解释经常是多样的,因此如何保证人们对一个时代的思潮的认识为真?这样一种直觉论断在思潮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但是却由于其本质主义而被简单化了。一个时代的思潮与这个时代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复杂而曲折的,并不只有内在关系,还有外在关系。即使是内在关系,也不应把它理解为本质与现象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因为这种理解忽视了它们之间可能具有某种共生或呼应的关系,以及它们有着某些共同的基础。

不过,冯友兰先生对于近现代的时代思潮的概括还是有其特点:“近代变法”和“现代革命”。这表示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政治,具体说是围绕着“变革”——变法与革命。这可以说是冯友兰先生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差不多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重大变革的世纪老人,冯友兰先生晚年所表达的时代问题意识本身具有思想史意义。

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有更明确、更深入思考的是冯契先生。他不但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注意到,中国哲学如何在各种思潮的冲突和融合中经历了与社会革命相应(甚至作为其先导)的哲学革命,即在广义认识论上发生了一次革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将冯友兰先生对近现代社会思潮的那个直觉性的概括作了更加理论化和体系化的诠释;而且直接指导我们具体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在给“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所作的总序中,冯契先生说:

在短短百年间,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间,如此多的思潮纷呈涌动,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可以